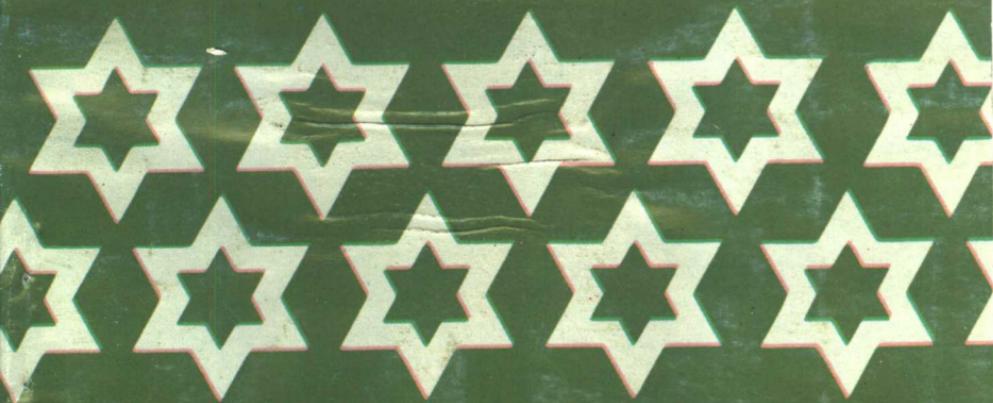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丛书

文明的载体 人性的容器

—中国陶瓷

程金城



文明的载体人性的容器

——中国陶瓷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源远流长 蔚为大观

——中国陶瓷时空	(1)
(一) 陶瓷界说	(2)
(二) 陶器源起	(3)
(三) 史前陶器	(8)
(四) 从陶到瓷	(17)
(五) 走向辉煌	(20)
(六) 瓷器盛世	(24)

二、鬼斧神工 随物宛转

——中国陶瓷造型	(30)
(一) 器形类别	(30)
(二) 流变轨迹	(36)
(三) 从器到艺	(42)

三、审美“纹”化 异彩纷呈

——中国陶瓷纹饰	(46)
(一) 质地色泽	(46)
(二) 纹饰风采	(50)

四、须臾古今 美不胜收

——中国陶瓷揽胜	(58)
(一) 彩绘世界	(58)
(二) 陶塑天地	(68)

(三) 超凡砖瓦.....	(73)
(四) 辉煌三彩.....	(76)
(五) 瓷器王国.....	(78)

五、多重意蕴 多维价值

——中国陶瓷文化	(82)
(一) 多重意蕴.....	(82)
(二) 文明见证.....	(85)
(三) 载道之器.....	(88)
(四) 物化心灵.....	(93)
(五) 艺术渊源.....	(97)

一、源远流长 蔚为大观

——中国陶瓷时空

泱泱中华古国，最初以陶瓷而为世界所知。灿烂辉煌的中国形象，起先以陶瓷为媒向世界展示。

历史告诉我们，陶瓷器物曾是人类创造的最主要的产品，是最重要的生活用具。它的水平曾经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的一种综合体现；当外国人开始享用着中国瓷器，品味着中国文化时，也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堪称瓷器—China 王国的国度。从此，“瓷器”—China 与“中国”同在，并成为永久的象征。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以全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我们已无法、也毋须摆脱陶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不仅仍然在继续创造着新的陶瓷产品，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使用着、观赏着和把玩着我们的祖先曾引以为荣的陶瓷器物，而且我们仍然时时与陶瓷文化相通相随，仍然毫无疑问地以 China 自豪地代表自己的国度。

无论何时，当我们回首历史、回顾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

时，我们都可能产生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疑惑：作为文明古国，我们有那样多的杰出创造和智慧的结晶，有那样丰富的曾领先世界平的物质文明，但是，何以唯有陶瓷成为中国的代称和象征？这是外国人的闭塞、片面和无知造成的误解呢？或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一种透过陶瓷显现的中国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的本质？

这个浅显而又深奥的疑惑，诱使我们进入中国陶瓷世界，深入陶瓷王国的腹地，领略它的万千风姿，进行一番亲身的感受和体悟。

（一）“陶”“瓷”界说

“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这个称谓反映了这两类器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瓷器与陶器相同的方面主要在于：第一，其基本工艺是相似的。陶器和瓷器都是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把土变成“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即通过烧制，使之产生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物质。瓷器是在陶器工艺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发明的，它沿袭并发展了陶器制作的基本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瓷器和陶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没有陶器，就没有瓷器。第二，陶器与瓷器的用途是大致相似的。陶器在前，瓷器在后，陶器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但瓷器出现以后，陶器与瓷器的发展并不是以后者代替前者，而是两者并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各自以其优势共同适应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满足人的物质和精

神的不同需要。直至今天，陶瓷并存的现象还在继续。陶瓷并称，正反映着它们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共同性和相通性。

陶器和瓷器相异的方面在于：一是其所用的原料是不同的。陶器的胎料是普通的黏土，瓷器的胎料是瓷土即高岭土^①。陶器胚胎的含铁量一般在3%以上，瓷器胚胎的含铁量一般在3%以下。二是与原料相关，陶器和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的火候是不同的。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900度左右，最多达到1000度左右；而瓷器则是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成的。陶器的原料不能耐受瓷器所能经受的高温，否则就会融化或变形而烧坏，而瓷器原料则不怕高温。若不能达到这样的高温就不能烧结成瓷器。另外，陶器不施釉或施低温釉，瓷器则多施釉。陶器由于胎质粗松，断面吸水率高，比如已知最早的黑陶即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夹碳黑陶，其吸水率高达18—25%，而瓷器经过高温焙烧，胎体坚固致密，断面基本不吸水，如果敲击能发出类似金属的声音。还有，陶器和瓷器在功用方面也有其不同的一面。

（二）陶器源起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见证。中国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是远古先民的重大发明，是继石器出现后我国最重要的和最丰富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发展变化贯穿了整个新石器时代，可以说它

^① 高岭土是瓷器的主要原料，因最初在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东乡高岭村发现而得名。这是一种主要由高岭石组成的、白中微带灰色或黄色的粘土。

是这个时代文明的标志；陶器在此后的发展和瓷器的出现，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历史意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陶器都是与人类生存发展最为密切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它的演变过程中熔铸进历史前进的足迹和人性解放的烙印，直至今天，陶瓷仍然伴随着我们而没有在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消失。

那么，陶器是怎样起源的呢？

这还是一个众说不一的谜。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只陶器诞生的缘由，但是考古发掘的陶器遗存提供了研究和推测的基础。而有关陶器的神话传说，则使陶器的源起染上了神秘的色彩并表明其古老的性质。

由于陶器在远古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们对它的依赖性，以及陶器特别是彩陶中浓郁的神秘色彩，所以在上古时代，便产生了许多关于陶器发明的神话传说。在我国有“神农耕而作陶”或“神农作瓦器”、“舜陶于河滨”、“宁封子为黄帝陶正”等神话传说。

神农、舜、和宁封子都是中国著名的神话人物，他们并不专司陶职，但是他们与制陶有着联系。神农氏，即炎帝，《周书》中曾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工藏实。”神农为民作陶，教民播种，又尝百草为民治病。他是农神与医药神，又是陶神。

舜，也是传说中的著名人物，是上古五帝之一。《史记》中说他“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寿，就时于负夏”。

在与作陶相关的神话传说中，关于宁封子的故事较为完

整。《列仙传》卷上记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再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宁封子为陶献身的精神十分感人，他的传说或许可以看作远古先民制作陶器过程中呕心沥血、将生命注入其中的一个曲折反映。后来在民间还有关于他的另外的传说，一个传说类似于前面引述的记载，说宁封为黄帝陶正，有一次在窑中架火烧陶，宁封上到窑顶添柴，不料窑已烧空，窑顶柴忽然塌下，宁封葬身火窟。人见烟灰中有宁封形影，随烟气冉冉上升，便说宁封火化登仙而不死。另一种传说，说的是在四川灌县青城山建福宫后有座丈人山，古时洪水泛滥，人民居住在洞穴。每次要到山下取水，可是没有盛水的器具，就以山下的润湿泥土为器具，所以容易破碎。一次偶然烧野兽，宁封从火中得到硬泥，于是他悟出了作陶器的道理。^①这后一个传说，不但赞扬了宁封对陶器制作的贡献，而且，就陶瓷史来说，这个传说对于陶器的起源无疑有重要的发生学的启迪意义。因为，关于陶器的起源有着种种不同的推测，而关于宁封悟出其中道理的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

神话毕竟不是科学，关于陶器的真正的起源，只有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去寻找。

陶器出现于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诸种因素得到共同变化的基础之上。

^① 见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 陶器的出现与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条件的关系

首先，陶器的出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关。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属“攫取性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有了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而陶器首先是一种实用器物，它在农业产生后，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已从火耕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作为陶器主要生产地的黄河流域已普遍种植粟和水稻。新石器时代晚期，除黄河、长江流域外，华南地区和太湖流域的锄耕农业也已有较大发展。农业的发达，是陶器需要的主要原因。与之形成比照，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渔猎经济则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些地区的陶器明显少于黄河、长江等流域。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陶器的生产状况成正比。

其次，与农业经济相联系，定居生活也是陶器发展的重要原因。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狩猎为主，过着游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第一是不十分需要陶器，第二是难以在游动中制造陶器和搬运陶器。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定居成为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也是陶器产生发展的因素之一。

陶器的产生与人类生产技术提高的关系

陶器从根本上说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直接产物，是原始先民经过长期实践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果。原始先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对于生存条件有了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客观上有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需要本身就是创造的动机，这是陶器源起的主体因素之

陶器从制坯到烧制成形，需要一定制陶技术、火候的掌握，而后来出现的其中带有各种色彩及其纹饰的陶器，则还需要刻划描绘技巧。

制陶业经过了从手制到轮制的过程。制陶先制坯，制坯的技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前期主要为手制。手制法有捏制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盘筑法等。手制的陶胎较厚，厚薄不均，器型不规整。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后期，出现了轮制。轮制是指用一种特制的轮盘制作器物，轮盘就是“工作台面”。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前期，轮制已普遍使用。轮制陶器的特点是，器型规整，浑圆，胎壁变薄，造型美观。从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形体中可以看出制陶技术和工具水平的发展。

从陶器制作工艺的这些方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先民曾经在陶器制作中表现出的创造性。

陶器因胎料不同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由于陶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易于破碎，因此更新频繁。而正是这种原因，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制陶技艺的进步所留下的工艺、形制、纹样以及发展更新的遗迹，它不仅足以使考古学者排成序列作为度量年代先后的标尺，而且反映着我国原始人类的历史足迹。

3. 陶器产生的直接动因和主观因素

前面说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是产生对陶器需求的现实基础，制陶工艺的创造和烧制技术的把握，是陶器得以制成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这之外，应该还有更为主要的内在的动因，直接触发了人类对于陶器的需求和创作冲

动。

一般认为，原始先民的编织技术早于陶器技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设想，先民们为了生活的需要，把黏土涂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使之能够耐火，以用于烧煮食物。后来，他们发现，用泥土可以直接成型，制作制器，于是诞生了有意创造的陶器。这个看法是恩格斯从莫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中提出的，后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个看法当然也有猜测的成分，但仍较为合理。而且从陶器及陶器上的篮纹、绳纹等纹饰分析，这种可能性就更大。

是的，也许人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第一个陶器是怎样诞生的。它可能是一种偶然的机会使人们发现了其中的精妙与奥秘，也许是某个先民独特的创造和发现。这种偶然性是存在的，否则就不会有“第一个”。但是，不管如何偶然，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生产、生活实践积累的结果和精神需求的表现。在这里，现实的需求和实践中的无意触发，制作的必然规律与偶然的灵感，都可能共同发生作用，促成了第一个陶器的诞生。正是在偶然性中可能包含着人类的某些原初的本性和本能，比如使一物变为他物所触发的创造性、好奇心，对艺术地掌握世界（模仿和“复制”他物）的欣喜、快意和美感等等，它体现史上人类伟大的发展。

（三）史前陶器

如果说，神话传说把作陶的始祖归附于神仙或圣人身上，只是为古老陶器的起源做了想象性地解释的话，那么，大量出土的陶器遗存则为我们了解陶瓷的历史提供了确凿的证

据。

从时间分度来看，中国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约一万年时间。我国考古学家根据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文化遗存所显示的社会发展变化和经济生活的状况，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大约距今 11000 年至 7500 年）、中期（大约距今 7500 年至 5000 年左右）和晚期（大约距今 5000 年至 4000 年）三个阶段^①。陶器的源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知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苏溧水县神仙洞遗址、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等都是陶器年代最久远的文化遗址。向上回溯陶器的源起的踪迹，有距今大约 7000—8000 年前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约 9000 余年前的广西桂林市甑皮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陶器。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是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村 10000 年左右的陶片。这些遗址中都有着大量的陶片或陶器。

从空间分布来看，史前陶器的发展状况是我国先民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区系都有陶器出土。

考古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地区、中国的北方沙漠草原地区这样四个大的范围划分区域。在这些区域里，又有若干“文化”系统，“文化”之下又以“类型”区分。一般以“××文化××类型”来标示不同的文化及其分属类别。“文化”区系之中可以包括不同地区的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以“仰韶文化”来说，其中就有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

^①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迄今（到本世纪 90 年代—引者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近 7000 处，以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有数十种。目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文化面貌较清楚的，在黄河流域，有其上游地区（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系统、渭河流域（包括豫西北和晋西南）的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系统，以现今河南为中心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大河村文化系统，黄河下游地区的有大汶口文化系统；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统，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鄂西和长江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系统，在南岭和武夷山脉以南地区，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系统，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系统；在阴山山脉以北地区，有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各种新石器文化，辽河流域则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① 在这四个大的区域中，各个具体的文化系统和类型中都发现有陶器的存在。

出于陶器的生产和传播在地域上并不是“规则”的，在时间上前后不一，呈现从中心地带向周边辐射的态势，所以，对于陶器类型的划分和文化系统的归属要考虑到这方面的相互关系。这里参考考古学著作^② 的分类，对陶器的类型和文化系统做整体的观照。

1. 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器

黄河中游地区包括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豫中及周围地区和冀中，冀南和豫北地区广大的区域。黄河中游是中国陶器的发源地。属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系统有：

① 《中国考古学通论》。

② 《中国考古学通论》。

(1) 分布在渭水流域及丹江上游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包括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陕西省华县北首岭、老官台和元君庙等遗址。其中老官台和大地湾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彩陶因年代的久远而具有重要意义。

(2) 分布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因 1921 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它是由瑞典人安特生 (J. G. Andeesson) 发现的中国第一个有彩陶的文化遗存。此后陆续发掘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类型主要有，以西安市半坡村遗址命名的半坡类型，以陕西省渭南市史家命名的史家类型，以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庙底沟类型和山西省芮城县西王村类型。这几种类型中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最为重要。仰韶文化大约存在公元前 5000 年—3000 年左右，延续约 2000 年之久。

(3) 分布在豫北豫南和淮河以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大河村文化。裴李岗文化因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其中有陶器。以郑州市东北郊的大河村遗址命名的大河村文化一、二期中，有一些独特的陶器出土，较为重要的有河南省临汝县阎村遗址发掘的鹤鱼石斧图形陶缸等。

此外，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还有大司空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等，其中也有陶器包括彩陶出土。

2. 黄河上游地区的陶器

黄河上游地区包括青海省东部、甘肃省洮河流域，渭河的上游和河西走廊的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等。这一地区的文化系统主要有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

(1)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因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

的发现而得名。马家窑类型分布于陕甘的泾、渭上游，西达黄河上游的青海同德县，已发现的遗址约有300多处。马家窑文化包括了石岭下类型（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流域，以及西汉水与洮河流域），马家窑类型（泾渭上游和西汉水及白龙江流域、以及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域），半山类型（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河西走廊、渭水上游等），马厂类型（分布与半山类似，但又有延伸）。马家窑文化以造型别致、制造精美的彩陶而著称于世，其器型之多样、纹样之繁缛、构图之独特，反映了彩陶艺术的鼎盛风貌。

（2）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以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发现而得名。分布比马家窑诸类型更广。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到白龙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齐家文化已发现的遗址有350多处。齐家文化的遗址一般位于河旁台地。齐家文化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其造型和纹饰都很有独特之处。在中原彩陶完全消失以后很长的时期，甘肃地区仍然存在着彩陶文化，直到春秋战国方才结束。齐家文化陶器就是延续最晚的陶器之一。

3. 黄河下游地区的陶器

这里的黄河下游地区是指现今山东省的鲁中、鲁南山地和鲁东丘陵地区。这一地区有前后相承袭的三种文化，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和西侧。北辛文化中的陶器很多，但彩陶数量很少，纹饰简单。

大汶口文化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发现而命名。分布在鲁中、鲁南和苏北的淮北地区。其晚期延至河南、安徽和东北辽东半岛地区。大汶口文化在时间上持续了一两千年，在